

56



湖北文史資料

——市縣政協文史資料選編

一九八九年第四輯
(總第二十九輯)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
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目 录

- 回忆先父吴禄贞……………吴忠华(1)
- 吴禄贞先生生平业绩……………傅光培(13)
- 回忆蒋作宾先生……………汤润琼(29)
- 先父蒋作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……………蒋硕健(40)
- 忆蒋作宾先生任德、奥公使的几件事……………胡天石(47)
- 我对汉俊的点滴回忆……………薛文淑(49)
- 回忆我父亲李汉俊烈士……………李声馥(57)
- 王世杰家世……………王和林等(62)
- 我所知道的王世杰先生一家……………杨静远(73)
- 我所知道的王世杰……………皮公亮(76)
- 回忆堂叔王世杰二三事……………王和林(80)
- 王世杰对家乡的关怀……………王文藻(84)
- 回忆我的丈夫李范一……………吴 瑛(87)
- 李范一先生事迹片断……………范仲文、刘连江(104)
- 学界先驱谈锡恩……………朱贡西(114)
- 师尊谈锡恩事略……………郑万选(118)
- 忆述谈锡恩先生……………谈 瀛(128)
- 谈锡恩对图书事业的卓著贡献……………陈小平(137)

回忆许莹琏同学的一些情况·····	梁漱溟(144)
怀念湖北乡村建设创导者许莹琏·····	胡起祥(145)
许以善言行实政 莹将光洁励廉偶 ——忆述许莹琏先生·····	谈 瀛(155)
怀念先父瞿干琴·····	瞿 琳(165)
回忆晏道刚先生·····	刘鸣皋(177)
回忆在雷法章先生身边的几年·····	王明璋(183)
记黄建中先生·····	顾学颀(194)
熊十力轶事·····	包惠僧(202)
湖北科技精英——我的父亲朱裕璧 ·····	朱宜莲、朱宜莹(212)
对朱贡西先生关于“武汉解放前大公中学的革命活动” 一文的质疑·····	李建生、王书瑶(232)

回忆先父吴禄贞

吴忠华

我今年已是81岁的人了。父亲辛亥殉难已74年，然而父亲的音容和许许多多往事，仍时常浮现脑际，对他的思念之情也一直很深很深。

幼年时期的父亲

我父亲于1880年3月6日出生在湖北省云梦县吴家台子的一个穷读书人家。我的曾祖父吴道亨，曾先后在湖北省黄陂、公安两县当过教谕（相当于后来的教育局长），一生两袖清风。我祖父吴利彬是个饱学的秀才，因为喜欢钻研当时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格致之学——物理、数学等自然科学，所以不能在科举路上取得进展，一生主要以教书为业，早年奔走四方，暮年才定居武昌。父亲16岁时，饱经风霜的祖父就与世长辞了。祖父在世时，家中仅有两百多亩田（约合10亩），而且是兄弟所共有的产业。他去世后，祖母彭梅仙与伯祖父分了家，带着我父亲和叔父另立门户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

我小时曾从祖母和其他长辈口中，听到一些关于父亲幼年时期的故事——

我父亲小时，是个相当顽皮的孩子，但正是从他的一些顽皮行为中，显示出他的聪明、好动、风趣、勇敢和机智的个性。

他七八岁时，与本家堂兄弟们一起，就读于本村私塾，教书

先生是 본家一位伯父。他们那一辈叔伯兄弟共10人，他排行第三。一到下午后半晌，这位老三便常常不知去向。当别人向先生报告时，先生则说：“他走了就走了，他的书都会背了，你们谁也不许走，都好好给我背书！”

那么这位老三哪儿去了呢？有时是下田帮人插秧、车水去了；有时是上树摘果子或掏鸟窝去了；有时是下池塘游泳去了；也有时是同小朋友们舞拳弄棍去了。

说起插秧，他本事还不小呢。他人虽小动作却很麻利，常常是开始时与别人并排插，插着插着就把别人落下了。此时，他会不失时机地用秧苗把别人圈在中间，用云梦农民的话来说，就是捉了别人的“乌龟”，给别人吃“蒸笼”。

一次他又上树了，祖母听说后又急又气，于是拿了根竹竿赶到树下，举着竹竿吓唬他，要他快下树。谁知，他扑通一声，从树上跳入了树下的池塘，祖母更加担心了，用竹竿拍打水面，要他上岸。结果是祖母在东边赶，他游到西边，祖母到西边，他又游到别处，再过一会儿干脆连个人影儿也不见了，祖母吓坏了，只好放下竹竿央告他上来。原来他一猛子扎入水下了，听祖母说只要他上来，不打他了，一下就从祖母眼皮下钻出了水面。他约10岁时，祖母有一次回娘家，一去数日未归，他就找到了他外婆家，到了那儿才知道祖母已到武昌去找刚从外省回到武昌的祖父去了。当时，他并不知道他们在武昌的住址，只知道祖父的一位住在汉口的朋友的住址，他想找到此人定能找到自己的父母。他已多年未见祖父的面了，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父亲，于是决定自己独自动身去武汉。云梦距武汉的水路相去200多里，当时交通又不便，加上他从未出过远门，身上又几乎分文无有，但这一切都难不住他。他终于设法搭了一条货船，先到汉口找到祖父的朋友，然后找到祖父母。这件事说明他从小就是一个知难而进的人。

少年时很有些“狂”

父亲十二三岁时，随祖父读书。一次祖父让他做诗，他竟脱口而出：“一拳打倒亚细亚，二脚踢翻欧罗巴……”。祖父一听，责怪他太狂了。其实，这种狂正可以说明他从小就有大志。当时中国正处在列强的侵略和吞食之下，父亲真恨不得把这些魑魅魍魉全赶走，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。

祖父常常为读书人改稿子，当时有些读书人写些八股文章，准备投到书局供编文选之用，总是求他修改润色。当祖父看到好文章时，往往不免称赞几句，父亲却不以为然。他无心走科举之路，所以也不欣赏那些八股文章。一次，听祖父夸某人的文章如何好，父亲就笑了笑说：“将来又多了一个大官的幕僚。”当然，这下少不了又要挨骂，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对自己将来的生活道路，已经有所选择。

父亲当时除对诗、词比较爱好外，就是喜爱格致学，老缠着祖父教这方面的知识。后来，这方面的知识，对他学习军事无疑帮了很大的忙。他在湖北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，成绩都是名列前茅。

他的“狂”还表现他决不迷信洋人。他在武备学堂学习时，教官都是从日本和德国请来的，课堂纪律十分严格。一次，一位日本教官给他们上几何课，在黑板上演算时，把题证错了。学生中年纪最小的父亲，竟不客气地从座位上起身走上讲台，对教官说：“你算错了！”接着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演算起来，使日本教官无言以对。这件事在学堂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！

不信鬼神

从前的人，大都相信鬼神，但父亲从不相信这一套，以胆大而出名，年轻的伙伴们常为此想办法吓唬他。

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，同学们与他打赌，要他独自在深夜去大操场呆上几小时，据说那个大操场时常闹鬼，父亲欣然接受了挑战，夜里带了一把马刀就独自一人去了。果然，半夜时从远处传来了阵阵怪叫声，犹如鬼哭狼嚎！接着两个“鬼怪”一蹦一跳地窜了过来。父亲立即拔出马刀，高声喝道：“是人还是鬼？我要砍了！”这一下，“鬼怪”立刻现了原形，赶紧求饶，原来是两个同学装的。

大约在他被派去日本学习之前，父亲曾抱着游戏和好奇的心理，参加过一次府县级的考试。当时的考场一般设在府学或县学里，考院的两侧，有许多两平方米的小“号舍”。考生通常头一天下午入场，入场后，即将大门加封，第二天才开门放出考生来。入夜时分，照例由一个差役敲着锣喊：“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！”气氛十分阴森可怕。相信迷信的人认为，鬼魂通常就在此时出没。那天夜里，父亲正在他的号子里准备写文章，突然，从外飞进来一样东西，他拾起来一看，是大半个梨，正好口渴，于是用小刀一削就吃了起来，还自语道：“这个鬼看来是报恩的！”门外的“鬼”见他还悠然自得地翘着二郎腿在那儿准备写文章，便伸手去抱他那只正好露在半截门帘外的脚。他毫不犹豫的一脚踢去，外边传来一声：“哎哟，我的妈呀！”他说：“鬼还有妈；我倒要看看。”原来又是熟人在试探他。

我们家住在北京大方家胡同时，曾把一位二十八九岁未嫁的堂姑姑接来同住。姑姑信佛，在后花园一间空房设了个佛堂。她知道父亲不信这些，所以老是避着他拜佛。一天，姑姑又去拜佛，还带了鲜果作供品，父亲发现后，也尾随进入。当他走进佛堂，看到那么些供果，伸手就拿了一个，擦擦就吃，还说：“哟，菩萨还吃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也吃点儿！”

女儿、儿子都一样

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在当时一般人中，是很严重的；父亲则不

是这样。

事有凑巧，母亲怀我的同时，姉娘也有了身孕，而且姉娘同一天生孩子。结果母亲早一个时辰生了我这个女儿，姉娘晚一个时辰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下我母亲心中未免感到有几分别扭。我父亲却愉快地说：“别看她是个姑娘，我的姑娘比儿子还要紧，将来要跟儿子一样受教育。”父亲虽早早离我们而去，母亲就按照他的遗愿来培养我们三姊妹，使我们都上了大学。

我从三岁起开始识字，家里为我请了一位老先生，每天教我几个字。刚去上课时，我很怕先生，一次，要小便也不敢说，竟尿了裤子。父亲知道这件事后，既感到好笑，又感到高兴，说我懂规矩，上课时不随便往外跑。后来送我上学的保姆，特向先生说明，先生以后就常问问我，是不是需要去小便。

我小时没像一般女孩那样穿过耳孔，也没有像当时其他女孩那样缠过足。本来奶奶曾哄我同意缠足，她说姑娘裹了脚穿鞋好看，哄得我让她们给裹上了。可太难受了，我自己把裹脚布解下来，扔到了一边。爸爸知道后，竟宣布不要给我缠足，于是不但我的脚得救了，而且两个妹妹也不必受缠足之苦了。

我四岁时，曾随母亲去过延吉，还记得是坐牛车到的那儿。当时父亲任吉林边务帮办，正与日本人交涉延边的领土主权问题。边务督办公署的大印平时就放在母亲房中；父亲手下的人要用印时，就叫我进去取。我问：“你们是不是要那个讨米口袋？”因为印装在一个印袋内，袋子的大小正好与当时乞丐用的讨米口袋差不多。父亲听说此事后，捧腹大笑，还连声夸我说得好！四岁的孩子不懂官印的作用，本是平常事，但父亲却因此夸我，不正说明他根本没把那颗印放在眼里吗？

父亲是爱我们的。我还在襁褓中时，他下班归来，总要叫人把我抱去给他看看。他在家时，晚饭后必定抽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玩一会儿。一次，他举着弟弟玩，一失手，孩子掉了下来，如

果不是母亲抢上去接着，就会摔坏了，为此挨了母亲一顿埋怨。

全家最后一次照全家福的照片，是在他遇难前半年。按照惯例，多半是母亲抱孩子，而这张照片我母亲空着手，父亲却抱着三妹，我和弟弟一个站在他左边，一个站在他右边。照片上没有四妹，那时她正在母亲腹里，父女没见着面呀！

父亲虽然爱我们，却绝不迁就我们。我还清楚地记得发生在我六七岁时的一件事：那年祖母从南京为我买了一套蓝缎绣花衣裤，我十分喜爱，每逢出门就要穿它。一天，全家要出去看电影。那时电影刚从国外传入，看电影可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。当天正赶上下雨，我还是坚持要穿那套蓝色花衣。父亲说会把衣服弄脏，不要穿了，可我使起性子来非穿不可，结果被父亲取消了我看电影的资格。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，以后再提什么要求时，都要考虑一下对不对，遇事也不敢那么任性了。

敬重老人

父亲小时虽说有点儿淘气，稍大后，对自己的父母和长辈，都是非常敬重的。祖父在父亲16岁那年，应邀去外地讲学，后来肺病犯了，归途中曾吃黄瓜解渴，临终前打嗝仍带黄瓜气味。黄瓜与祖父的死就这样联系起来。父亲由于怀念自己的父亲，竟从此不许黄瓜进吴家的门。

祖父死后，他对祖母格外孝顺，为分担家庭经济重担，他16岁就进织布局做工，后又投考新军。

我还记得他下班回家后，总是先到祖母房内，陪她说一阵话。当时祖母还不过50刚出头的人。身体又很硬朗，但父亲总是去搀扶她，或把她想要拿的东西送到她手中，伺候得很周到。

父亲被调到北京后，仍惦记着在云梦老家的伯父（我的伯祖父），先是为他伯父做了皮袍寄回去，后来又攒下一笔钱，寄回去给老人盖房子。受他接济、照顾的长辈和亲戚还有很多。

仗义疏财，济人危难

父亲为人非常豪爽，遇到自己的朋友、同志有困难时，总是竭力相助，既不怕花钱，又不怕担风险。

慷慨解囊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，虽然后来有优厚的薪俸，但家庭生活过得并不宽裕，连一点积蓄也没有，他身后留下的是一笔银行欠款。

革命活动需要经费，他就捐助。例如他到北京后，知道了湖北的同志在武昌成立日知会，立即捐款；又如他在延吉时，筹集了千元之资，作为革命党人在东北的活动经费；有些被追捕的同志要逃往国外避难，他也资助；个别有为的年轻人，想出国深造；他就多方为之筹划，并为他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。

经他设法营救的革命同志，也是很多的。湖北日知会几个主要负责人，被捕后判了死刑，经他营救减了刑，使这些人绝处逢生，武昌首义后，除两人病死狱中外，都恢复了自由。

1910年，同盟会几个同志谋炸摄政王载沣，事败后，黄复生和汪兆铭两人被捕，要判死刑。他亲自出马找到肃亲王善耆晓以利害说：“京城到处有革命党，要是把这两人公开在菜市口杀头，只怕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！”威胁还真见效，加上他多方活动，又花了不少钱，这两个人始得减刑为终身监禁，到辛亥革命后获释。其实我父亲根本不认识这两个人。

去年，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周锡卿教授，携夫人来我家作客。他一再对我说：“我的父亲是吴老伯营救的，他在世时，常对我们谈及此事。如果不是吴老伯救了他的命，他在1909年就死了，哪能一直活到1964年。如果那样，也就没有我和我现在这一家人了。”他夫人补充道：“他们共有五个子女，十个孙子和外孙。”原来周先生的父亲叫周震麟，1903年时曾与黄兴同时在长沙西园明德学堂任教，这个学堂是一个革命据点，也是华兴会的

诞生地。我父亲与周老先生都参加了华兴会的筹备工作和成立大会，因而相识。1909年，周老先生在京师大学堂任教，当时清廷为舆论所迫，搞了一个所谓民主立宪预备会议，周老先生带学生前去旁听。为了戳穿其骗局，周在会场带头高呼口号，并向主席台投掷座椅，使全场大乱，周当场被捕。事后经父亲多方设法营救，周老先生始得脱离囹圄，重返故里。

百姓叫他吴青天

日俄战争后，日本吞并了朝鲜，又策划侵占我东北，于1907年派兵占领“间岛”一延吉、汪清、和龙、珲春四县。他们打着保护韩民的幌子，强行设立军政机构，并向清政府提出保有领事裁判权和警察权等无理要求。父亲作为边务大臣，与日本政府的代表进行交涉，据理力争，使日军不得不退出侵占的地方，承认“间岛”是中国领土。

他在延吉工作的三年中（先为帮办，后为督办），不仅保住了这片土地，同时还办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，如加强边防建设、办学校、修筑道路、发展生产等。他还有一个开发建设延边的宏伟计划，并写成了意见书。

清廷对他是不放心的，但对日交涉又非得用他不可，在“间岛协议”（《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》）签订后不久，赶紧以“经费支绌”为借口，将边务公署撤销，把他调回了北京。

父亲是1910年春回北京的。那年在母亲晒衣物时，我发现了几件不寻常的东西，那就是万民伞与万民衣。伞与衣的外层，满是一指多宽、两寸来长的绶条，五颜六色，每个条上都写有一个人名。我问母亲这是什么东西，她告诉我这叫万民伞、万民衣，是父亲离开延吉时乡亲们送的，还告诉我百姓称父亲为“吴青天”。他们舍不得父亲离去，但又留不住，只好以此来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爱戴。

延吉人民对父亲的感情是深厚的，第二年父亲遇难的噩耗传到延吉时，百姓纷纷痛哭流涕，并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开追悼会。直至今日，延吉人民还没有忘记他，还以各种方式为他举行纪念活动。

噩耗传来

1911年秋，父亲原筹划借清廷阅兵之机，举行秋操起义，结果秋操因武昌起义而中断，他于是积极寻找新的时机。当时他所辖的第六镇与张绍曾所辖的二十镇，是守卫清廷东西大门的两支主力。他说服同情革命的张绍曾与他联合行动，随后又说服了山西义军，共同组成了燕晋联军，决定于11月7日开始行动，直捣清廷的老窝——北京。就在他“将军虏廷，建不世勋”的前几个小时，敌人对他下毒手了！

当父亲筹划北方起义时，就悄悄把全家老小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，以免家人在北京遭到不测。父亲的驻地在石家庄，母亲时常派人出去打听他的消息。一天，我发现大人们神色异常，又听说什么“首级没有了”。原来是父亲被人暗杀了，这噩耗真如晴天霹雳！我知道再也见不到那么疼爱我的父亲时，就放声大哭，哭了整整一天，饭不吃茶不饮，母亲不得不强忍悲痛来劝慰我。

当时，我只有七周岁，弟弟四岁，三妹两岁，四妹是父亲遇难一周后出世的。从此我一下变成了“大人”，处处关心弟弟妹妹。一次表哥带我和弟弟去铁路边玩，突然有一列火车开来，在路轨上玩的弟弟吓呆了，我赶快去抱他，但他又胖又重，我哪里抱得动。我急中生智，按倒他，抱着他就地一滚，这才脱离了危险。弟妹们要是生了病，我会守在床边不肯离去。

1912年3月，在上海张园和山西太原，分别为父亲召开了追悼大会。上海的追悼大会是由黄兴等人发起的，会上宣读了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祭文。1912年3月17日的上海《时报》，以头

版头条刊登了孙中山先生的祭文全文，祭文的开头是：“荆山楚水，磅礴精英，代有伟人，振我汉声。觥觥吴公，盖世之杰，雄图不展，捐躯殉国。”孙中山先生还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第一号抚恤令，决定对父亲以陆军例赐恤金，用以“宣示天下以不负忠烈之意”。

我还能记得一点儿去山西太原参加追悼会的情形。追悼会开得很隆重，参加的人数多达数万，母亲是带着我和弟弟去的，到达后就由当地特别指定的两位女教师陪伴我们。会场是设在露天，搭有好几个台子，中间一个大的的是主席台，母亲登台讲了话，还带着我们到别的台上去与各界代表们见面。

1913年11月7日，也就是父亲殉国的两周年忌日，他的墓在他遇难地石家庄火车站旁建成，外形为纪念塔式，墓碑上刻着“故燕晋联军大将军授卿吴公之墓”，墓侧还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屋，是凭吊楼，母亲带我和弟妹们去扫墓时，就住在那儿。

1982年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，将墓迁到市内风景秀丽的长安公园内，仍按当年原式样修建。这年清明时节，我们应邀参加了新墓落成后的扫墓仪式。我和弟弟忠黄（现居香港）、三妹忠敏携子女前往。1984年清明时，侨居美国的四妹忠瑛，也回国前往石家庄扫墓。

我们每次去石家庄，当地省、市领导都亲切接见我们，负责接待的同志照顾十分周到，使我们感到非常温暖。我深深体会到：父亲不仅属于我，更属于中国人民。

深明大义的母亲

我外祖父也是位读书人，母亲景静淑从小跟他读了不少书，后来成了一位非常贤慧的妇女。父亲的全部心思都用在革命事业上，伺候老人养育孩子的担子，都落在母亲的肩上。父亲当时可以说是高官厚禄什么都有了，一般的妇女大约就该劝丈夫保住这

些就够，还革命干什么。但我母亲却从不这样，只是暗暗地为父亲担心。父亲去世得那样早，母亲独自侍奉老人和把孩子们培养成人，是不容易的。由于过度操劳，她只活了47岁，祖母反而在她之后去世。

母亲与父亲感情很好，相互尊重，闲暇时夫妻间也和和诗、填填词，别有一番情趣。父亲死后，她在与父亲的合影背后，题了两首诗，以寄思念之情。这张题诗的照片，放入一个匣内，匣放入父亲棺木随葬，她宣布从此不再写诗。

父亲死后，我们由天津移居上海，当时是乘船去的。当船进入黄浦江口时，突然一件出我们意料外的事发生了一一母亲纵身投入了黄浦江。原来母亲认为护送一家老小的任务她已完成，岸上有叔叔在接我们，又得了一笔革命同志捐赠的抚恤费用，生活有了指望，她可以放心地去追随父亲去了。幸亏船上及时发现了，放下救生艇，把她救了上来，救她时，她还一再让别人别救她，后来在们我一家老小的央求下，她才断了此念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母亲的恩情。“五·四”运动以前，女孩子上学阻力是很大的，母亲不顾一些亲友的反对，坚决送我上学。我14岁就入了北京女师大附中，以后又进了女师大。母亲曾对人说：“我没有万贯家财留给孩子，我要让他们读好书，这就是他们一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。”这笔财富我们姐弟四人一直用到如今。

1916年初，袁世凯搞帝制复辟的消息传来后，母亲十分气愤，她说：“难道人（指父亲）就白死了不成！”母亲之所以这样说，一方面因为父亲是为推翻帝制为民主革命而殉国的，历史的车轮岂能倒转？！另一面种种迹象表明，袁世凯正是暗杀父亲的元凶，岂能让这个卖国贼为所欲为！武昌起义后，为镇压起义军，清廷再次起用袁世凯，先是派他为钦差大臣，去武汉督师围剿义军，接着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。袁世凯于是大耍其反革

命的两手把戏：一方面陈兵长江，向革命者要挟议和；另一方面挟制清帝退位，目的是他自己窃取大权。父亲筹划北方起义，既可解武汉之围，又可粉碎袁世凯的美梦，当时的形势就是“有吴无袁。”袁世凯视父亲为他实现阴谋的最大威胁，终于采取了卑鄙的暗杀手段。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，数月后，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丧了命！

父亲虽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，然而他所梦寐以求民族解放和祖国的繁荣昌盛，终于在今天实现了，他的在天之灵一定是含笑九泉的！

1985年4月于厦门

(徐小玉 整理)

(云梦县政协提供)

吴禄贞先生生平业绩

傅光培

投笔从戎

辛亥革命前夕，清王朝衰微破败，外侮日甚，国上人人宰割。年仅15岁的吴禄贞，因不堪麻布厂工头的欺凌，愤而辞工投入武昌工兵营当兵，然官长待之如奴隶，亦无法忍受，乃遵严命应童子试。16岁时（1896年），湖北武备学堂开办，禄贞毅然前往报名，但因未足18岁，且身躯矮小，学堂拒不收录。禄贞当即陈书，略谓：“我祖父是优贡，父亲是秀才，自己也是秀才，曾习童工，吃军粮，略识诗文，粗知武术，现虽年仅二八，但志愿投笔从戎，为的是救国雪耻……”。并赋诗一首：“开卷喜读战国策，濡笔爱草从军赋，安得一战定三韩，投笔从戎争先赴。”其爱国热情，直从笔端出。武备学堂总教习蔡锡勇阅后，至为惊诧，拍案叫好，急将吴文转呈总督张之洞。张阅后，大加赞赏，乃破例准其入学，并传令嘉奖，通报文武学堂，以示提倡。时武备学堂由德国元帅兴登堡任总教习（后曾出任德国总统），堂规极严，学生长进很快。

湖北武备学堂原定三年毕业后，送德国深造。丁酉年（1897年），日本派专使来华，胁迫直隶（今河北）、两江、湖广总督从武备学堂挑选学生40人，从书院学堂挑选40人到日本留学，以示“提携”。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武备学堂学生吴禄贞、傅慈祥、刘百刚、万廷斌、吴祖荫、吴元泽等20人，另加书院数人，

去日就学。谁知武备学堂的这20人，都不愿前往，请见张之洞，声称：“日本是我国死敌，我们和倭寇不共戴天，不愿去日。”张之洞见后，严峻地告诫学生：“不去不行，大家想想，我国的维新，比日本要早30年，现今，我们海军、陆军数量远远超过日本，为什么日本却打败了我们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武器、战术不如人家嘛！”转而安抚地说：“你们不是读过《孙子兵法》么？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嘛！派你们去，就是为了‘知彼’，为了战胜他们！选派的你们20人，全是我最喜欢的门生，你们是肩负重任，重任在肩，不容犹豫。”待张之洞入内堂后，傅慈祥抢先说：“对！这回我们要学孙大圣，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，摸清他的五脏六腑。”吴禄贞大笑说：“去！将来闹他个天翻地覆。”

留学日本

1898年春，吴禄贞被选派赴日留学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为培养具有大和魂的武士道精神，对学生操练，极为严格，且处罚苛刻。不论是冰天雪地，炎天暑热，或狂风暴雨的时刻，都要赤膊短裤，进行翻、爬、滚、打，连皇太子也不能例外。中国留学生一般体质瘦弱，尤其是皇族子孙，对此苦不堪言。唯独吴禄贞，虽其身躯不够魁梧，然幼受“吴门神棍”传授，攀缘鱼跃，更是独树一帜，加以秉赋聪慧，勤奋刻苦，很快就成为个中佼佼，全校师生，刮目相看。

一次，学校组织学生前往神武庙（现改名为武道庙）观瞻，禄贞和同学们见东乡隆盛一副盛气凌人、不可一世的架势，目睹陈列的掳掠我国的战利品，先是仰天长啸，感慨万千，继而与同学们一道，研讨日本与西欧各国的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科学发达之原因，对照我国丧权辱国、腐败无能，激起他爱国义愤，从而更加勤学苦练，以伸雪耻报国之志。